

● 主编 蒋炳钊 石奕龙 黄向春
● 出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

龙虎山崖葬与百越民族

文
化

龙虎山崖葬与百越民族文化

蒋炳钊、石奕龙、黄向春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 号

龙虎山崖葬与百越民族文化

主 编 蒋炳钊 石奕龙 黄向春
责任编辑 尹峰文 封面设计 刘永泉
责任校对 尹峰文 版式设计 张志立

出版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 130021)
发行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扬州邗江古籍印刷厂
经销者 扬州邗江古籍书店

开 本 850×1168
印 张 12
印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0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2624-9/K·131
定 价 22.00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百越民族史研究的新视野

- 百越民族史第十届学术研讨会综述(代序)…………… 黄向春 (1)
- 试论悬棺葬的流传与古代越族的西迁…………… 陈明芳 (5)
- 贵溪崖墓考古二十年…………… 许智范 (13)
- 龙虎山悬棺研究…………… 谢健根 (18)
- 关于江西龙虎山悬棺葬若干问题的再讨论…………… 彭适凡 丁俊屏 (30)
- 五行观念在贵溪崖墓中的反映…………… 徐 菁 (41)
- 龙虎山发掘利用崖墓文化做活旅游文章的构想…………… 李志坚 (47)
- 关于开发鹰潭“古越族民俗文化村”旅游项目的基本构思
…………… 陈文华 (60)
- 再论武夷山崖洞墓的一些问题…………… 蒋炳钊 (69)
- 武夷九曲越人崖葬的遗存和方式在汉文化中的变异…………… 郭志超 连心豪 (80)
- 武夷山西南隅“木客”越人悬棺葬管窥…………… 郭志超 董建辉 (90)
- 花山崖壁画附近岩洞葬初步考察述略…………… 黄汝训 黄 喆 (96)
- 民族志中之崖葬记录…………… 汪宁生 (102)
- 江西龙虎山船棺入洞表演参观记…………… 陈国强 (105)
- 关于崖葬的几点思考…………… 余 丰 (108)
- 干越四题…………… 刘美崧 (116)
- 赣东北地区出土战国秦汉古越族铜铎初探…………… 余庆民 (124)
- 铜都德兴越族文化再探…………… 孙以刚 (130)
- 新干青铜器群立鹿造型意义探赜…………… 周广明 (134)
- 绍兴印山越王允常墓的发现及其意义…………… 陈元甫 (149)
- 古越民族文化的多源与多流浅析…………… 张志立 (164)
- 百越民族与海洋文化…………… 林蔚文 (170)
- 论闽越海洋人文的传承变异——关于现代惠东
人文的历史故事…………… 蓝达居 林元平 (182)

关于闽越族行从妻居婚俗的质疑·····	石奕龙	(192)
从秦汉以后百越民族发展史看国家政权在汉越互动中的作用 ——兼论传统中国族群关系中的“华/夷”观念 和“中心/边缘”结构·····	黄向春 魏爱棠	(196)
古百越语言在今闽、客族群中的遗存——以词源学为例 ·····	邓晓华	(213)
论“女书”字符构成中反映的稻作文化现象 及其与古越人的关系·····	谢志民	(225)
东瓯歧海文化初探·····	陈顺利 符艺楠	(240)
台北“古越阁”所藏吴越具铭兵器述论 ——兼谈“勾践”与“句践”的纠纷问题·····	董楚平	(249)
左江史画研究的重大突破·····	杨在道 马官治	(260)
试论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 ——兼论良渚文化与防风国·····	方酉生	(275)
从工具制作看远古时期台湾和贵州高原的 文化联系·····	冷天放	(286)
附录： 百越民族史研究文献索引(1922年~1999年)···	张志立 编	(294)
后 记·····		(365)

百越民族史研究的新视野

——百越民族史第十届学术研讨会综述（代序）

黄向春

由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局联合主办，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办的“百越民族史第十届学术研究会”于1999年10月12日至14日在鹰潭市龙虎山宾馆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以及福建、江西、浙江、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高等院校、研究所、博物馆等27个单位有关专家教授和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提交一批有一定质量的学术论文。会议分别就崖葬、干越的历史与文化、百越与海洋文化的关系、百越各支系与地方传统以及百越与汉族的族群互动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交流，并对跨世纪的学会工作、民族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以及学术研究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崖葬及其所关涉的民族史、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及科技史等方面的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崖葬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其地域范围与古百越地大体重合，因而其主体族属当为越。龙虎山崖墓年代久远（为春秋战国时期，仅次于武夷山悬棺葬），分布密集，保存完好，文化内涵丰富，在中国崖葬文化圈内占有重要地位，充分展示了干越的社会生活、信仰习俗与科技水平。关于悬棺升置技术和方法，与会者普遍认为不可能只有唯一的一种，提升法、垂降法、脚手架法等各种技术方法都有可能。不同地理环境和时空背景中的崖葬可能采取不同的方法。崖葬的特点多具有“水”的因素，反映出江海民族或习水民族的生存环境与文化心理。各地崖葬虽可归入同一文化类型，但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和内涵，对其成因的探讨应作更具体的分析和更深入的民族志调查。从时空构成上看，崖葬基本上呈东早西晚趋势，因此有代表认为崖葬起源

于东南沿海地区，并渐次向西南流传，大体上是溯长江而上，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崖葬文化圈的形成，是文化传播或民族迁徙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对崖葬的讨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以往对其族属、年代问题的简单追寻，如强调对民族志材料（包括现当代中外民族志）的搜集和比较研究，关注到从悬棺葬到斜坡洞葬再到平地葬的内在发展逻辑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变迁和族群互动关系，提出了悬棺葬“越源汉流”的观点并凸显了汉文化因素和宗教信仰因素在崖葬流变过程中所充当的重要角色。

对于“干越”问题，与会者经过讨论达成了更多的共识，并对干越的历史文化及其对中华古代文明的贡献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干越是以赣东北地区为活动中心的百越的一支，与其东的于越、其西的杨越为不同的支系，并共同构成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越人的主体。干越士著文化一脉相承，同时也受到中原及吴、楚因素的影响。龙虎山崖墓所反映的正是干越人的丧葬制度、宗教信仰乃至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干越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其鲜明的地方特色为中国青铜文明的多元共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更具启发意义的是，不少与会者以江西为着眼点论及了南中国地方传统的族群背景，讨论了干越、山越所形成和继续的族群力量及其对江西地方发展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把地方史的叙述纳入到民族史的框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百越民族史的内涵。

对百越社会文化的探讨始终是百越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次会议也不例外。与会者分别从婚姻习俗、文字传统、丧葬制度、工具制作、岩画艺术及地方特色等方面就百越社会文化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和创见的观点，如：通过对文献的详密考证并结合制度变迁的背景提出闽越人行一夫一妻制的嫁娶婚而非从妻居婚；通过寻找与史籍记载的对应关系解读左江岩画，认为这些岩画是百越支系——瓯骆对其历史的形象记述（即“史画”），它们反映的是“婴齐入朝、复归”、“瓯骆相攻”等重大史实；绍兴越王允常墓的特征是先秦秦公陵园制度南传的反映，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传播与越地传统相结合的产物等。尽管其中某些问题尚待更深入的探讨，

但其思路无疑具有借鉴价值，为百越社会文化研究的精细化和文化多元视角的切入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与会者普遍认为，只有在多元视角的关照下，通过更多精细化研究的积累，才能为总体的百越社会文化重建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才能更深刻理解华南历史发展的族群性和地方性特色

百越与海洋文化关系密切，探讨百越海洋文化的结构与继承变异是本次会议的另一重要论题。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百越海洋文化可归结为由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组成的“二维结构”，前者包括水稻种植、舟船航行、渔捞作业及干栏建筑等，后者包括鸟、蛇崇拜、鸟田、羽人信仰及饭稻羹鱼、舟船祭祀、纹身习俗等，两者相辅相承，对越地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作为百越遗裔，疍民成为闽越海洋人文的传承者，在汉文化不断扩张、汉越族群互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疍民通过文化调适获得了有限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为此而不得不接受汉化的事实，表现出一种既固守传统、又认同主流社会的矛盾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族群互动关系的复杂性。

此外，本次会议还就总体上的百越史、百越文化、越汉关系展开了讨论，如强调百越的“多源多流”，注重以汉人为主体的封建集权国家对族群关系的重要影响，指出古代百越民族是南中国汉人的最主要来源等。这些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通关注和热烈讨论。部分与会者提出，民族史的研究不能抛开“国家”的大背景。传统中国国家体系的建构过程包含两个方向上的维度：以汉为主体的王朝政权的“外拓”和非汉族群的“内化”，两者构成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华/夷”观念贯穿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国家不仅是一个权力实体，同时也是一种象征资源，围绕这一资源展开的争夺决定了传统中国族群“边界”的动态本质。同时，国家体系对边缘的渗透并不一定意味着汉人的大量迁入并取代土著而成为主体，土著族群为求得生存而认同国家、认同汉文化并由此而“化夷为汉”是一个恒常现象，因此，探讨这一现象的机制、过程、相应的历史叙述及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应该成为民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百越民族史的领域正是实践这一

学术思想的广阔天地。在这个层面上说，本次会议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总之，以深入稳健的传统研究为基础，结合理论的关怀与方法的更新，是本次研讨会的特点，也是其成功和价值之所在，通过广泛的交流与对话，与会者达成了以下共识：包括百越民族史在内的传统民族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举世公认的，但同时也面临着新时期学科发展的挑战，民族史的研究应该广泛吸纳、借鉴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志、社会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和理论方法，摆脱传统取向上单一“追根溯源”模式的束缚，在发扬传统学科优势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领域，以期获得更旺盛的生命力。上述各问题的提出以及在探讨中对引入人类学族群理论的倡导，就是部分与会者以此为出发点所做的努力与尝试。此外，即将跨入新世纪的学术团体与学术活动如何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更好地契合社会需求，为经济建设服务并同时获得自身健康发展的动力，也是本次会议所关注的一个话题。通过与当地旅游部门的合作，本次会议的成功经验为探讨地方经济发展（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学术研究相辅相成、互为推动的运作模式提供了借鉴。

试论悬棺葬的流传与古代越族的西迁

陈明芳

一、我国悬棺葬的分布及其族属

自本世纪3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川南发现悬棺葬以来，至今已有60多年。这种广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东南亚等地的奇异葬俗，一直都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从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悬棺葬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据考古发掘和调查，目前已知福建、江西、浙江、台湾、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均有悬棺葬遗迹。福建、江西的悬棺葬分布在武夷山东、西两侧九曲溪畔和上清河两岸。湖南的悬棺葬主要分布在湘西地区沅江，酉水流域及其江河两岸。贵州松桃仙人岭和岑巩白岩的悬棺葬分布在属沅江支流的松江河和龙江河两岸。四川、湖北的长江三峡、湖北清江流域、四川东南乌江和酉水流域、四川西南部和云南省东北部是我国悬棺葬分布密集，而且保存完好的地区。广西左右江流域也有较多的悬棺葬遗迹。据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记载，在浙南、闽北沿海地区的“安家之民”和台湾土著“夷州之民”早在三国时期就有悬棺葬俗。现在浙江地区有悬棺葬遗存的已经很少，近年只在浙江省西南，靠近江西省上饶地区的遂昌县松阳溪畔发现悬棺葬遗迹。在祖国海岛台湾省兰屿的雅美人至近现代尚保留了悬棺葬俗。

关于悬棺葬的族属，武夷山的悬棺葬是闽越人的葬俗，江西贵溪仙岩的悬棺葬是干越人的葬俗，广西左右江流域的悬棺葬是壮族及其先民骆越人的葬俗。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区长水、酉水、沅江及其支流的悬棺葬为“五溪蛮”中僚或仡佬人的葬俗。川南及其邻近的滇东北地区的悬棺葬，自古以来被称为“僰人悬棺”。历史文献将楚人又称为“僚”或“土僚蛮”，明代又称其为“都掌蛮”，许多学者均已撰文论述“都掌蛮”实际上就是川南、滇东北地区的“僚”或“土僚”。湖北、四川长江流域的悬棺葬历史文献记载为僰人和亓人的葬俗，他们与古代越僚人关系密切，尤其是亓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船为

家的水上居民，直到近现代，广东仍疍民。台湾兰屿的雅美人是台湾土著高山族中的一支，与古代百越人关系密切。综上所述，我国悬棺葬的族属大多与古代越、僚人有关。

二、悬棺葬的年代

据已知的考古资料，福建武夷山的悬棺葬年代最早，武夷山白岩和观音岩的船棺经碳十四测定，距今三千多年，相当于商周时期⁽¹⁾。江西贵溪仙岩的悬棺葬经碳十四测定，距今两千多年，大约为春秋至战国时期⁽²⁾。湖北、四川长江三峡地区的悬棺葬，根据棺内随葬物品推断，应是战国至两汉时期的文化遗存⁽³⁾。湘、鄂、川、黔古代五溪蛮地的悬棺葬，根据历史文献资料，随葬物品以及碳十四测定等方面的资料判断，这一广大地区的悬棺葬流行年代大约从西晋一直流行到明代中期⁽⁴⁾。广西左右江流域的悬棺葬根据历史文献和随葬物品分析，延续时间可能为唐至明清⁽⁵⁾。

四川省南部珙县、兴文县及邻近的云南东北部昭通、盐津、镇雄等地的“僰人悬棺”，根据历史文献和随葬物品分析，大致是元明时期的文化遗存⁽⁶⁾。

三、悬棺葬的起源及其流传

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表明，悬棺葬突出的特点是葬地必然选择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和船形棺的使用。这两个特点反映出悬棺葬与居住在江河大海的民族密切相关。这种葬俗是海洋民族心理素质的反映。

就目前所知，船形棺是悬棺葬中较早的葬具，而最早使用的船棺应是实用器物。福建武夷山的悬棺葬年代最早，从武夷山的白岩和观音岩两具船棺的大小形制来看，一具长约5米，一具长3.5米，棺盖、棺身合起来如同带有船篷的船只，与笔者在实地调查中所见闽北南平等地江河中和闽南厦门等沿海地区使用的篷船非常相似。

宋周辉《清波杂录》卷七《南海录》：“南人送死，无棺槨之具，……凿大小木若小舟以为臼，土人名舂塘，死者多殁于舂塘以葬。”80年代初，广州市西汉墓中出土了许多整木挖凿的半独木舟式棺木，广西罗泊湾西汉墓中也出土了整木挖凿的船形棺。到解放初期，海南岛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黎族仍然使用整木挖凿成的独木舟式棺

材⁽⁷⁾。

直到现在东南亚地区仍行悬棺葬的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中部山区的托拉贾 (Toradja) 人, 一般平民仍然使用整木挖凿的船形棺 (长约 2 米, 棺盖、棺身合起来如同一只小船)。据说, 他们使用船形棺的用意是, 他们的祖先两、三千年前由中印半岛渡海到印度尼西亚群岛, 成为当地土著居民, 后来由于人口增多, 受外来民族的排挤, 渐渐迁到山区。人死后, 使用船形棺是为了不忘自己的祖先, 以便死者灵魂能与渡海迁移的祖先团聚⁽⁸⁾。

上述所有资料表明, 悬棺葬俗起源于居住江河大海的民族, 这种葬俗是海洋民族的风习。

我国古代越人主要居住在我国东南地区, 这里既有高山大河, 又有丘陵和沿海地区的冲积平原。江河纵横, 河流密布, 气候温暖潮湿。从事水中捕捞的渔猎经济与稻作农业都是他们的主要经济部门。“陆事寡而水事众”, “习于水斗, 便于用舟”都充分说明, 越人的生产和生活与江河水域密不可分, 船是他们生产和生活中重要的用具和交通工具。善于造船和用船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因此, 死后以船为棺与古代越人及其后裔的心理素质甚相符合。起初用作悬棺葬具的船形棺或许本身就是一种实用器物。悬棺葬俗应是起源于我国东南地区古越人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百越文化与祖国其他民族交往增多, 悬棺葬临江面水的高崖绝壁这种置棺方式没有改变, 但船形棺的大小, 形状在逐渐发生变化。比如, 武夷山东侧江西龙虎山仙岩的悬棺葬具已没有福建武夷山那种与实用船只相同的船棺, 棺木形制有园形、方形、带足的似干栏式建筑的棺木。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悬棺葬具, 时代较晚, 已变成了头大足小的长约 2 米的方形棺。在湘、鄂、川、黔地区的五溪蛮地悬棺葬非常盛行, 但二次葬都大量出现, 悬棺大小一般只长 1—1.5 米。广西左右江流域, 宋至明清时代的悬棺葬, 大多数为二次葬, 棺木形制一般都不足 2 米, 从实地调查所见, 棺内基本上都是待尸体腐烂后再将骨骸捡入重新安葬的。但不论棺木的形状、大小如何变化, 用整木挖凿棺木的传统制作方法都始终没有改变。

悬棺葬具变化的另一特点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船形棺或独木舟式棺越往西南内地深入，便越多地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棺木形制与棺头大足小的方形棺越趋一致。如川南、滇东北地区的人悬棺，时代已到明末，棺木从外表上看，与汉族棺材已无大差别。因此从时间和空间来看，基本上是东早西晚，可以认为悬棺葬最早起源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它的流传方向是从东南向西南。我国悬棺葬的分布限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大体是溯长江逐渐西传，造成这种分布状况的原因，应该是文化传播或者民族迁徙。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国古代越人由东南向西南地区的流传、迁徙，本文重点谈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悬棺葬的关系，西南地区的悬棺葬主要以川南为例。

四、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悬棺葬都是越僚人的葬俗。

1、川南悬棺葬的族属特征

川南、滇东北一带的悬棺葬，当地人和地方史志均称为“僂人悬棺”、“僂人坟”等等。

关于僂人的族属，一种意见认为“僂”是羌彝系统的民族，另一种意见认为“僂”属越僚系统的民族。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的产生与我国古代史籍和一些地方志在不同历史时期将“僂”用作不同民族的称呼有关。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成为羌彝系统民族的先民或是越僚民族的先民都是可能的。当代许多学者考证，古时“僂”、“濮”互通，从江应梁先生濮为越说，“僂”应为越僚系统的民族。

川南一带行悬棺葬的“人”又被称为“都掌蛮”，其文化特点与我国古代越僚系统的民族许多共同之处。

(1) 凿齿

从晋代到清代，许多历史文献均详细记载了华南和西南地区僚或仡佬民族的凿齿习俗。如晋张华《博物志》“荆州极西南至蜀诸民曰僚子……（生儿）既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太平寰宇记·戎州风俗》记载了今珙县、兴文县一带僚人的凿齿习俗。元李系《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土僚蛮，叙州南鸟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击去左右两齿，然后婚娶。”直到清代末年，贵州仡佬族仍有

凿齿习俗。

凿齿习俗最早见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其早中期遗址的人骨架，凿齿率高达 70—93%，而在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江苏马家浜文化、福建县石山文化遗址、台湾恒春遗址，广东河宕遗址等中都有凿齿习俗的发现，这些文化遗址的居民都是百越民族的先民。

现保存在四川省博物馆的珙县麻塘坝 10 具悬棺中取出的人骨架里，7 具 20 岁以上成年人骨架中有 6 具骨架凿去上颌侧切牙，凿齿率高达 85.7%⁽⁹⁾。

从各地凿齿习俗分布的情况来看，往往在近海或海岛民族中较为常见，因此常把凿齿作为海洋民族的风俗之一。

(2) 大量使用铜鼓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历史文物，它不仅是乐器，而且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铜鼓主要分布在华南和东南亚地区，其中以我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南部和湖南西部以及越南北部分布最为稠密。在秦汉或者更早的时代，居住两广的西瓯、骆越人已大量使用铜鼓。从铜鼓的分布和族居来看，自古以来大多与越、僚系统的民族有关，因此铜鼓被当作是古代越僚人另一重要文化特征。

《太平寰宇记》卷 785 引裴渊《广州记》曰：“俚僚铜鼓以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方以为奇。初成，悬于庭，克辰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雄。”

在珙县麻塘坝楚人悬棺周围发现了大量用红色绘制的崖画，在这些画中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圆圈符号，圆圈内有十字、五角星或者六角星的图案，是绘画者以简炼的手法抓住了铜鼓面纹如同四射的太阳光芒这一突出特点。把这些有太阳纹的圆圈解释为铜鼓图像是非常确切的。

《珙县志》卷十三《军政·平蛮始末》载，明成化二年兵部尚书程信督军镇压叙南都掌蛮，“攻三都六乡一千四百五十七寨，斩首三千级，生擒九百五十三人，获铜鼓六十三面。”《兴文县志》卷四又载，万历元年，明军在镇压都掌人的决定性战役中：“获诸葛铜鼓九十三，

铜鼓锅各一，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巅群蛮毕集，今已矣，鼓失而蛮运终矣。”

据文献记载在川南地区仅珙县和兴文县的僰人拥有的铜鼓就多达200多面。笔者在珙县、兴文县实地考察时，见到珙县出土的铜鼓一面，都掌人聚居的兴文县九丝山附近出土的两汉至唐宋时期的铜鼓3面和铜锅一口。

(3) 穿着桶裙

我国越、僚系统的民族大多穿着桶裙，这种服饰与我国古代越人居住江河海滨，多从事水中捕捞和稻作农业有关。因此，桶裙成为越僚民族的特殊服饰。《新唐书》、田汝成《炎徼记闻》、《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史文献都记载了华南地区僚或仡佬人穿着桶裙的文化习俗。至今我国古代越僚系统民族的后裔——壮侗语族许多民族的妇女仍着桶裙。

麻塘坝取下的10具僰人悬棺的随葬物品中有7条桶裙、13条裤，其形制十分特殊，整条裤的形状呈等边三角形，与中山大学文物室收藏的海南岛黎族男子穿着的“吊伞”相似，这种吊伞既似短裙又类三角裤。因此可见，川南僰人也具有穿着桶裙的文化特征。

(4) 与我国古代越、僚系统民族一致的命名方法

川南僰人悬棺葬分布的区域地名多冠以“洛”、“罗”、“落”。如《珙县志》载，有洛表、洛亥、洛肇、洛甫、洛凹坝、洛渡、罗通、罗场、罗旺等等。《高县志》载，有洛场、洛沐柔、洛祥等等地名。

据研究，以“洛”名地实为壮族习俗，以两广而论，特别是广西，以洛或与洛同音或音近之字雒、罗、乐、陆等字作地名者比比皆是。如广西的罗城、雒容、罗田、罗西、平乐、陆川、庐圩等等不胜枚举。在壮语中，把山间平地称为“罗”，稍含有山地之意。

50年代中山大学梁钊韬教授到海南岛腹心地区调查时，黎族老妇解释“莱”(loi)为山野之意，与《太平寰宇记·儋州风俗》所载：“儋州俗呼山岭为黎”相符合。在壮语和黎语中，“莱”和“洛”音近，含义相同。

历史文献记载，我国古代越人“水行山处”。笔者到川南调查所见，珙县、兴文县的僰人悬棺均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流域，依山傍水，而僰人（又被称为都掌人）生活环境全是崇山峻岭或者山间

谷地，因此，以“洛”名其住地与广西壮族和海南岛黎族有相同的含义。

(5) 从川南民间故事看“僰人”与海洋民族的关系

在珙县、兴文县有关僰人的民间故事流传很广，这些民间故事清新活泼、优美动人。其中许多故事与江河湖海有关。如《麻塘坝阿群配龙女》讲的是行悬棺葬的僰人母系祖先原是生活在水中的“龙女”，《石船》的故事是讲僰人首领阿大王、阿二王和他们的妹妹方三与兴风作浪、危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水怪英勇搏斗，最终战胜水怪的故事。因此，川南各地修建的“龙君三圣庙”供奉的并非龙王、龙女，而是三位僰人首领。另外，《人鱼与悬棺》等故事均涉及到江河湖海、鱼龙、蛟、龟。

古代的民族文化与其居住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一个自来就住在深山里的民族，在他们的文化艺术中不可能有关于江河海洋题材的强烈反映。珙县的僰人崖画中亦有鱼、钓鱼的生活情景，这些都说明了僰人以前曾是“水行山处”的民族。

最生动的例子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中部山区的托拉贾人，他们目前虽然居住在非常闭塞的山区，但是他们千百年来人死后都葬在依山傍水的高崖绝壁和使用船形棺的传统习俗始终未变。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保留古代祖先生活在滨海地区的传统。

悬棺葬在西南地区的流传提供了我国古代越人溯长江而上，向西迁徙的信息。但是，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僰人虽然与古代越僚人有密切关系，但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珙县僰人悬棺周围绝壁上的崖画是川南僰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生动反映。僰人崖画中的动物形象有70多个，而马就占了60个，既有人骑在马背上扬鞭奔驰、手持各种器械的图像，也有马厩饲养和放牧马匹的情景。表现出僰人养马业的发达和骑术的高超。僰人居住的川、滇交界地区是崇山峻岭或高山谷地，马匹既是农业生产上的畜力，又是山区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这种情况表明，僰人虽然与古代越、僚民族有密切联系，但由于他们地处西南内地，与生活在东南沿

海地区的古越人在时间上相距千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经济生活，使他们早已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们共同体。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各自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

悬棺葬在向西流传的过程中，必然会与汉族或者其他民族产生交流，在不同民族之间的频繁交流，民族的自然同化或者融合也会产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的分化和融合总是不断发生的。通过对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悬棺葬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探讨，有利于认识我国民族融合的规律。几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同为缔造中华民族的历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 释：

(1)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县文化馆《福建武夷山白岩崖洞墓清理简报》；曾凡、杨启成、傅尚节《关于武夷山船棺葬的调查和初步研究》，均载《文物》1980年第6期。

(2)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贵溪县文化馆《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

(3)舒之梅《湖北秭归、宜昌三处悬棺葬调查简记》，《民族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1982年12月版。林向：《川东峡江地区的崖葬》，《民族学研究》第四辑。

(4)拙著《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1996年4月第二次印刷。

(5)(6)拙著《中国悬棺葬》。

(7)拙著《论船棺葬》，《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8)《国家地理杂志·托拉贾传奇》。

(9)四川省博物馆、珙县文化馆《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人”悬棺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6期。

(10)韩康信、潘其凤《我国拔牙风俗的意义及其流传》，《考古》1981年第1期。